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

薛才德 / 主编

YUYAN JIECHU YU YUYAN BILIAO

学林出版社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

薛才德 / 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薛才德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80730 - 313 - 8

I. 语… II. 薛… III. 语言融合—文集 IV.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2545 号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

编 者——薛才德

责任编辑——刘 嫻

特约编辑——周 伟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23

字 数——32 万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313 - 8/H. 45

定 价——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是当前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无论是语言的共时比较还是历时比较都必须关注语言的接触问题,这是因为没有一种语言或方言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跟其他语言或方言发生接触关系。可以说忽略语言接触,就不可能深刻认识语言结构和语言的演变规律。语言接触实质上首先是说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不同民族或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接触和交往,通过语言接触研究还可以追溯族群历史文化交流的历史。可见,语言接触研究大有可为。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方言》杂志编辑部和上海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5月20日至22日在上海大学召开。应邀参加会议的有50多位学者,分别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十多个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本书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大致包括五方面的内容:语言接触的理论探讨和宏观考察,语言(或方言)的接触问题,语言历史比较中的接触问题,语言(或方言)的共时比较,其他语言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在论文中表达的观点和看法,给人深刻的启示。

胡明扬的《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出,过去对语言接触或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就事论事地分析相互影响的结果比较多,而对制约这种相互影响的众多内在和外在条件的注意显然不够,因此对纷繁复杂,乃至截然相反的结果就缺乏解释。现在有必要探索一下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和因素在影响和制约语言接触和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周磊的《我国境内语言接触的层次和方式》指出,在我国语言接触的研究首先可以分为两大层次,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和非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在亲属语言内部还包括方言与方言的接触。语言接触途径的方式有区域性语言接触和非区域性语言接触。区域性语言接触还可以分双语人与双语人的语言接触,双语人与单语人的语言接触。双语人又因第二语言习得程度的不同可以分成若干等级,使语言的接触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

徐世璇的《语言接触性衰变的阶段性和质变标志》认为,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有不断丰富和趋于衰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首要原因取决于语言使用功能的扬抑,语言衰变是不断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衰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语言使用功能的衰退和结构系统的弱化互为因果、相互作用。提出了语言在发生衰退、濒危、消亡几个转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质变标志。

王远新、刘玉屏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的变化》从语言接触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组概念说起,讨论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制约作用,分析语言接触过程中影响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主要因素。提出,应当建立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之间关系的有效分析模式和检验模式。

邓晓华的《论客家话的来源——兼论客畲关系》认为客方言并非完全来源于古北方汉语,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语言与华南土著居民语言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客家方言音韵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但词汇则受南方土著语言影响深刻。客家与畲族关系极其密切,其共同来源具有多元性。

吕嵩雁的《台湾后山客语的音韵扩散现象初探》从语音层面声母、韵母和声调演变的角度,指出,台湾后山客家话在其他语言和方言的影响下,异质成分大量增加,根据语言接触的不同类型,把后山客家话分为闽南语式客语、国语式客语、南岛语式客语。

卢彦杰的《从语言接触看族群互动——从新竹地区客家旧地名出发》从实际的语料史料搜集着手,以各族群的语言特色作为证据,试着理出这些传统地名的源头,并且主要从语言上的特点,找出三大族群过去为本地区命名的证据,借此为各族群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

过的足迹作见证。

杨秀明的《论闽南方言的形成及其向漳州的拓展》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主要以闽南南端的漳州为参照点,通过大量文化语言学事实证明,闽南先民对中原先进文化及其“中原汉语”的学习运用应该大大早于晋唐时期。以晋唐为下限,闽南一带已经处于“闽越语”和“中原汉语”并存的“双语阶段”。

盖兴之、高慧宜的《少数民族汉语中介语与汉语方言研究》用中介语理论和历史比较法比较分析了云南纳西族丽江汉语和甘肃汉族嘴头话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揭示少数民族汉语中介语在形成汉语新方言和汉语方言中少数民族语言底层的作用,指出在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中,既有汉语自身的分化,也有异体语言移植的融合。

汤志祥的《语言接触中不同语言的势力消长——深圳城市语言现状透视》指出,深圳从原来的纯粹的岭南语言和文化区一跃而发展成为华南,乃至全国普通话强势区。其中经历了语言(方言)接触、语言(方言)筛选、语言(方言)认同的过程,另外还与语言政策、语言使用和语言心理等多种因素相关。

骆峰、蒋秀娟的《湖南临武方言兼用的基本模式及发展趋势》就临武县双言模式的功能类型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临武双言现象的发展变化情况。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临武的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双言使用的格局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同功能变体之间的竞争明显,对内交际语方面,具有权威土话由中心向外扩散的特点;对外交际语方面,呈现出由官话向普通话靠拢发展为转用普通话的趋势。

薛才德的《上海话语音的演变与方言接触》指出,160多年来,上海话语音演变迅速,大趋势是简化,但仍保持着原来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掺杂其他方言音系的成分。上海话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苏南吴语和浙北吴语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其中苏州话的影响大于宁波话的影响。上海话从第三期到第四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普通话的影响明显。

余志鸿的《元代直译体汉语名词的“数”范畴》以《蒙古秘史》(直译本)为基本语料,对元代汉语名词“数”的表述法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

分析,并从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作了理论概括,指出“数十名十复数后缀”等表数格式正是汉语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语言接触的产物。

袁宾、何小宛的《汉语史研究中的语言接触问题》通过汉语史中涉及语言接触问题的几个案例,说明如下观点:不同语种之间,句型渗透的难度大于词语渗透,汉语里具有口语基础的新生句型,一般都能够从汉语内部探明其确实来历;近代汉语时期,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通语与北方方言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两者之间语言形式的渗透比较顺畅;该时期南、北方言及通语的接触中,通语和北方方言是强势方,其语言形式有可能进入或影响南方方言。

向德珍的《中古汉语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着重探讨了中古汉语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的来源,认为中古出现的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既与上古以来汉语常用的判断句之间存在历史的继承关系,同时,这种特殊判断句最早且较多地出现于汉译佛经,它的出现也受到了语言接触(佛经翻译)的影响。

黄行的《汉藏语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问题》认为,如果用于比较的语言材料一样而得到的结论不同,分歧应该出在方法和标准上。文章采用关系词的历史层次、是否分布于核心词和关系词的音韵规律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汉藏语系一些语言之间词汇的语源关系做了初步的分析。

郑张尚芳的《语言同源与接触的鉴别问题》认为,在原始生活核心词及语族内部比较较多用到的词中,择取有语言特色的词,常可起标记性的作用,它们的特征既区别于周边语言,应该是固有词,比较固有词之间的大量语源联系而建立的语系,才有价值。在同语族的核心词汇比较中,发现各语系语族都有一些特征词,语族特征词说明在该语族形成前就共同拥有这些词了,所以鉴别同源关系作用特大。语言比较中同源成分发生音义差移的机会往往比借词中更多,音义参差都会造成比较上的困难,需要特别关注。所以在作同源成分比较时,一是需要先从同语族语言的比较中尽可能掌握该词最古的原始形式,二是多观察语言词义转移的实例,掌握词义变化的普遍规律。

杨立权的《语言接触与原始白语的历史层次》以“三重证据法”为参照,通过白语方言、亲属语和接触语的比较,分析出现代白语中积淀着的三种时间因子:由母语遗传给不同子语的原生性因子(同源);白

语独立形成的次生性因子(自源);子语与子语、子语与外源语互相接触之后借取的再生性因子(异源)。同时,以相关层次为依据,大致可以把白语的演变过程分为原始白语、古代白语和现代白语三个时期。在原始白语时期,析取出的历史层次主要是白-汉藏(B-ST)、白-藏缅(B-TB)、白-侗台(B-DT)、白-孟高棉(B-MG)和白-苗瑶(B-MY)。白语和上古汉语的关系字层次则不太清晰。

钱乃荣、罗永强的《吴语和老湘语中的浊音声母》通过对吴语和老湘语的浊音声母作实验语音学的分析,从而探讨两地浊音声母的异同。

刘劲荣的《拉祜语、汉语四音格词比较》对拉祜语、汉语两种亲属语言的四音格词进行了描写和比较。对制约两种语言四音格词异同特征的语言内部机制做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四音格词的产生、发展与语言机制相适应,拉祜语、汉语在四音格词上呈现出的共性特征是语言类型学范畴上的一致。

郭辉、徐红梅的《淮北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之比较》从词义、词形和词源三个方面描述了淮北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别。

张振兴、张惠英的《从指示词“那、这、个”用作地名说起》认为,汉语指示词“那、者、这、个”用作地名在南方北方都能见到,所以对地名“那”来自壮语水田的成说要作进一步考虑。

辛世彪的《海南闽语中的韵摄分调》指出,海南闽语一般保留阴阳两个入声,但无论古清入字还是古浊入字都发生了变化。变化以文白读和古韵摄为条件:文读音读塞尾入声,白读音中属咸山宕江梗5摄的清声母字读长入或高去,无塞音尾,少数点读为喉塞尾入声,浊声母字归阳去,少数点读读为喉塞尾入声;属深臻曾通4摄的字无论清浊文白仍读入声。韵摄分调是海南闽语入声演变的重要特征。

王晓君的《赣语新余方言的拟声词语法格式——兼比较吴赣方言的后缀“叫”》指出,新余方言的拟声词格式有四种,纯拟声词、重叠式拟声词、“A沙”式拟声词和“AA叫”式拟声词。其中,“AA叫”式拟声词尤其发达,含义丰富,语法化程度最高。文章比较了赣、吴语的“AA叫”式词语,认为它们都来源于拟声词。吴语中的“AA叫”式词语的语法化程度比赣语更高。赣、吴语中的“AA叫”式词语的存在,深层

原因可能是方言接触的产物。

金健、青菁的《语言接触中的日语外来词现象》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外来词进行了界定,从而明确日语汉字词的外来词属性,肯定日语外来词见证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语言功能。

最后要感谢上海大学文学院和中文系领导的大力支持,“第二届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都得到了中文教育高地项目基金的资助。

编者

2007年8月25日

目 录

前言	1
----------	---

理论探讨和宏观考察

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	胡明扬	3
我国境内语言接触的层次和方式	周 磊	8
语言接触性衰变的阶段性和质变标志	徐世璠	16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的变化	王远新 刘玉屏	30

语言(方言)之间的接触影响

论客家话的来源——兼论客畲关系	邓晓华	43
台湾后山客语的音韵扩散现象初探	吕嵩雁	51
从语言接触看族群互动——从新竹地区客家旧地名出发	卢彦杰	81
论闽南方言的形成及其向漳州的拓展	杨秀明	102
少数民族汉语中介语与汉语方言研究	盖兴之 高慧宜	109
语言接触中不同语言的势力消长——深圳城市语言现状透视	汤志祥	122
湖南临武方言兼用的基本模式及发展趋势 ...	骆 峰 蒋秀娟	140
上海话语音的演变与方言接触	薛才德	156

元代直译体汉语名词的“数”范畴	余志鸿	169
汉语史研究中的语言接触问题	袁 宾 何小宛	186
中古汉语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	向德珍	203

历史比较中的语言接触

汉藏语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问题	黄 行	219
语言同源与接触的鉴别问题	郑张尚芳	229
语言接触与原始白语的历史层次	杨立权	237

语言(方言)的共时比较

吴语和老湘语中的浊音声母	钱乃荣 罗永强	267
拉祜语、汉语四音格词比较	刘劲荣	288
淮北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之比较	郭 辉 徐红梅	305

其他语言问题探讨

从指示词“那、这、个”用作地名说起	张振兴 张惠英	315
海南闽语中的韵摄分调	辛世彪	324
赣语新余方言的拟声词语法格式——兼比较吴赣方言的 后缀“叫”	王晓君	333
语言接触中的日语外来词现象	金 婕 青 菁	346

理论探讨和宏观考察

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胡明扬

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内涵的相互影响。西方国家的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从洋泾浜语或称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开始的,并召开过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出现了接触语言学那样的术语,似乎已经成了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①。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和理论探索起步较晚,但是也已经做了不少努力,特别是关心和本来就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学者,如吴安其、江荻、李葆嘉、陈保亚、意西微萨·阿错等同志在这方面都有不少建树。但是,从我国语言学界的总体情况来看,特别是从这些年来出版的众多语言学理论教材的内容来看,似乎我们在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个问题上仍然还停留在 50 年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有关阐述的水平上。斯大林指出,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是最稳固的,借词往往是一些表示本民族语言中没有的异文化的事物和概念的词语;他还认为,两种不同语言的混合或融合不可能产生第三种独立的语言,而只可能一种语言战胜另一种语言,战胜的语言保留了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战败的语言则丧失了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在战胜的语言中可能保留了一些战败语言的词汇,这也就是所谓的底层现象。因此我们在语言接触问题上往往只限于说,最可能发生的现象是借词,而如果借词数量够大,借词中非本族语的音位可能融入本民族语言之中,使本民族语言的音位系统中增加了原本没有的新的音位,不过这样的新的音位往往只出现

^① 参见张兴权:《接触语言学及其发展》,载戴庆厦等编《中国民族语言论丛》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9—288 页。

在借词的语音结构中。至于语法结构似乎的确非常稳固,不太受异族语言的影响。不过现代汉语的欧化语法给我们出了难题,该怎么解释?不是不如意的被动句,如“他被选上了人大代表”,还有一些新的词缀,如“线性、规范化、能见度”中的“性、化、度”等等,算不算语法问题?该怎么解释?西方语言学家,包括显然是根据本国语言学家提供的素材和观点发表有关语言学的意见的斯大林,都认为两种语言的混合不可能产生第三种独立的语言,可是在我国境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发现并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无可置疑的真正意义上的混合语,这种新的既不同于混合以前的那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又跟这两种语言都有密切关系,本身具有全部独立语言功能的混合语又该怎么解释?西方国家的确至今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混合语,因此西方语言学家对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观点应该说还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是否全面,是否深刻,最终是否站得住脚,完全值得探讨。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语言众多,相互之间的影响十分复杂,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素材,也给我们出了很多研究课题,大有可为。

我们认为,过去对语言接触或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就事论事地分析相互影响的结果比较多,而对制约这种相互影响的众多内在和外在条件的注意显然不够,因此对纷繁复杂,乃至截然相反的结果就缺乏解释。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亚洲和非洲一些民族地区,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克里奥耳语,或者英语和法语替代了不少殖民地当地的语言,并且从来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混合语,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居然出现了外来的统治民族反而采用了被统治民族汉族的语言,还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真正意义上的混合语?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探索一下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和因素在影响和制约语言接触和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语言接触可以先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类,直接接触指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直接进行口头语言交际,间接接触指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没有直接的口头语言交际,而只是通过书面语或现代通讯媒体进行的间接交际。不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接触,都还有一个广度和深度问题。边境地区零星的直接接触和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内部,

互相通婚、杂居，日常进行频繁的口头交际，语言接触的结果明显不同。当然，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可以有种种中间状态，例如我国常见的少数民族在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中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方式。不同语言群体在军事、政治（包括实施的语言政策）、经济、文化、人口数量等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占优势的语言是强势语言，不占优势的语言是弱势语言，一般说来总是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学习，受强势语言的影响，而强势语言受弱势语言的影响一般较小，甚或不受任何影响。除此以外，不同民族的异族语言的态度也起重要作用。最后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对相互影响起重要作用。一般说来，两种不同语言的亲缘关系越近，越容易产生深刻的影响，关系越远，影响也就会小一些，甚至拒绝接受影响。当然这些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和因素是综合作用的，孤立地看问题是不恰当的。

在西方世界，殖民主义的扩张，在殖民地实行语言强迫同化政策，在公共场合、教育系统强迫使用殖民当局的语言，而禁止使用殖民地原住民的语言，因此两种语言完全处于不平等地位，因而也可能激发原住民的爱国热情，在语言态度上抵制学习殖民当局的语言，但是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在殖民当局先进严密的统治体制和行政权力压迫下，处于绝对弱势的原住民语言被消灭了，殖民当局的语言战胜并替代了当地原住民的语言，或者产生了所谓的克里奥耳语，也就是母语化了的洋泾浜语，这就是西方语言学家反映的语言接触理论关于混合语理论的实质。中国的多民族状态是在封建社会早期就基本形成，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民族歧视思想，但是和进入资本主义末期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还是有很大差别，而且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语言同化政策的重大政治意义，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强迫语言同化的局面，再加长期处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封闭状态，在边缘地区，天高皇帝远，不同民族百姓之间和平共处，通婚杂居现象十分普遍，解放以后这种局面也始终没有重大变化，这种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外在条件，就为真正的语言混合或融合创造了条件。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欧化语法现象的条件是与五四以后大量西方语言著作的中译本的传播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间接全面接触影响

到语法层面的实例。一般说来,语法结构的确是比较稳固的,不容易受异族语言的影响。但是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汉语没有像西方语言那样的形态变化,不同的语法结构主要反映在使用不同的虚词和语序,改变一下语序和虚词,语法结构就发生了变化,跟西方语言的形态变化发生变化要涉及音位的不同组合不一样,换用一个虚词,改变一下语序,就像引进一个新词一样,比改变一个常用的音节内部的音位组合要方便得多,另外像不表示不如意的被动句至今只见于书面语,始终无法进入没有文化的老百姓的口语,这也说明语法结构还是比较稳固的,不容易动摇,更不容易被替代。再举一个方言之间互相影响的实例。现在上海有的年轻人的确会说“我吃勒夜饭勒”,“依吃勒夜饭勒哦?”这让老年人听起来根本不是上海话,因为违反了老上海话的两条语法规则,一是上海话根本没有“勒”这样的虚词,用的是“仔”;句末应该用“哉/才”,二是否定句和疑问句宾语必须提前,“我夜饭吃过才”“依夜饭吃过哦?”这种语法结构上的变化显然是受处于强势地位的普通话的影响,而上海话和普通话都是汉语的方言,亲缘关系很近,容易受影响,并且只是换用几个虚词,就像引进几个新词一样,所以就发生了变化。上海话的“侬”现在已经完全被宁波话的“阿拉”替代了,这也是因为上海话和宁波话亲缘关系近,没有抵触感,再加上上海有大都市的风尚,别人这么说,赶时髦也跟着说就流行开来了。北京话和普通话有一个“咱们”,上海人没有学,因为差得太远。可是在三四十年代,不少上海人学苏州话说“敌个,爱个”,那就是因为亲缘关系近,有时候年轻人分不清哪是上海话,哪是苏州话。

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一般最容易产生表示新鲜事物的借词,即使偶尔的零星接触也能产生借词。张骞去了一趟西域就带回来“葡萄”和“苜蓿”等等中国原本没有的新鲜事物,同时也引进了有关的借词。那么为什么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首先表现在借词上呢?阿错引用了“凸显”理论来加以解释,因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互相接触的时候,相同的事物使用不同的词语(当然声音也完全不同)最为凸显,所以首先出现借词。阿错的解释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跟传染病的传播不同,不能想象两种不同语言在边境地区的零星接触可以影响到整个语言,因此,语言联盟,认为同一地区的不同语言互相